

THE
PHILATELIC
HISTORY
OF CHINA

中国集邮史

下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

ALL CHINA

PHILATELIC FEDERATION

北 京 出 版 社

THE
PHILATELIC
HISTORY
OF CHINA

中国集邮史

下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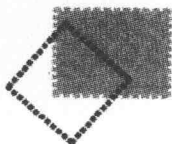
ALL CHINA

PHILATELIC FEDERATION

北 京 出 版 社

第 八 章

中国集邮发展的新时期 (1978 年 ~ 1982 年)



概 述

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对“文革”否定的事物，通过实践重新进行思考评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错误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在新旧交替的历史嬗变期，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表现得十分活跃，集邮作为群众性文化活动也很快恢复。集邮者怀着劫后余生的欣喜，从隐蔽状态下走出来，整理邮票，执笔为文，探讨集邮体会，书写回忆录，以记下自己亲知亲历的集邮历史。

1978年，国务院批示同意邮电部“关于邮票发行和扩大邮票出口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扩大邮票题材范围，提高邮票设计质量，恢复国内集邮业务。1978年7月1日，中国邮票公司国内营业部开业。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体育报》等报纸开始刊登新邮信息和集邮文章。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对集邮的肯定，表明了国家提倡集邮的态度。

然而，社会转轨初期，旧的观念尚存，新的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集邮作为民间自发性的文化活动，只能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当代先进的集邮观念、集邮方式、市场意识尚未注入中国集邮的肌体之中。比如围绕集邮活动产生的经济现象：个人邮票的买卖、邮票的增值等等，仍然被作为“邮德”问题受到指责。国家对邮票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仍持否定态度。某些部门时而

采取围抄市场，没收邮票的办法进行惩罚。有的集邮组织严禁会员在会内买卖邮票，甚至会内交换也不提倡。邮展中也设置种种清规戒律，连辛亥革命烈士邮票、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国家邮票也不准展出。这些现象与 60 年代初期的集邮状况惊人的相似。

但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毕竟势不可挡。进入 80 年代，集邮在经过两三年的蓄势后产生突变，主要表现在：

1. 集邮成员的变化。

一些 60 年代的集邮者，经历“文革”浩劫之后，心有余悸，认为集邮不是人生第一需要，取舍由人，不如放弃，另求他乐。

少数有成就的集邮家则以积极的态度继续从事他们所热爱过的集邮活动，成为新时期集邮队伍的中坚力量。

这一时期，有不少 60 年代后期出生的青少年加入集邮行列。他们集邮起步的时代造就了他们的高视点，加上对国外当代集邮观念的迅速吸收，易出成就。这一代集邮者在十几年后，有不少在学术研究和国际邮展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2. 集邮市场的形成。

进入 80 年代，各地邮票公司纷纷成立，但邮票公司供应的票品远远不能满足集邮所需。市场经济的催生，使一个个自发的邮票市场在全国大中城市陆续形成。由于顺应国家体制改革的大势，他们终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

3. 民间集邮团体的成立。

改革开放带来宽松的政治局面，使集邮者从 20 多年来形成的分散封闭的集邮方式中走了出来。他们自发联络，寻求文化部门的支持，成立集邮组织。

中国集邮虽然进入新时期，但集邮方式仍沿袭五六十年代的老套路，传统集邮的人居多。在传统集邮中，又以收集新中国邮票为主；专题集邮仍以动物、植物、名人、体育、宇航等大范围的专题邮票作收集对象，而且仅收集邮票，不集相关的封、片、

简、戳。集邮方法和集邮用具也相对落后，人们对多功能邮册、贴票册、护邮袋、编组邮集等当代集邮方法恍如隔世。由于没有工具书，集邮者头脑中对目录、价格的概念十分淡漠。尽管当时集邮者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积极性，但全国整体集邮水平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更难以与世界集邮水平相比。

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成立，是中国集邮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中国集邮活动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集邮活动

一、集邮活动的新开端

1977年1月8日，邮电部发行《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邮票。在北京各支局出售时，络绎不绝的购票人群中不但有集邮者，还有相当多的不集邮的群众。他们以怀念周总理、憎恶“四人帮”的复杂心情，购买这套金光闪闪的邮票。市内一些邮局很快售罄，近郊邮局卖得也很快，它成为十几年来人们购买最踊跃的邮票。有的集邮者还自制了首日封实寄，留住这个新时代之初的值得纪念的日子。严冬之后，使人感到几丝集邮复苏的暖意。

1977年初春，北京一些集邮者先就活跃起来。他们串联约会，沟通信息，商讨邮事，还相互补充“文革”中散落或遗漏的邮票。朱祖威当时有一张“毛泽东为日本工人朋友题词”邮票的照片，他说是在1976年从一位女医生那里拍下的。这张邮票是女医生从河北保定来信的信封上洗下的，邮戳盖在左下角，戳文为“河北.1968.”。朱祖威以集邮者特有的敏锐，判定这是一枚未发行票，在动乱的年月流出而贴用，十分珍贵。

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朱祖威与周围中老年集邮者形成了一

个活跃的集邮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均有较深的集邮资历，丰富的邮识，藏品具有一定水准。他们的集聚使个人的集邮活动能力得以充分发挥。1979年成立的北京鼓楼集邮研究会，就是以他们作为该会的骨干。

1978年，开始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将当时查抄的邮票归还集邮者本人。但是，由于北京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早于其他省市，许多查抄物品没有登记在册，致使相当多的集邮者的邮票无处查找。

上海是中国集邮的发祥地，集邮在上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文革”中，上海集邮界也是重灾区，在恢复时期，上海的步子迈得也很快。在这个时期，刘广实是上海集邮界的活跃人物，他与上海集邮家以及中青年集邮者都有密切交往。他的家成为中老年集邮者的聚会场所。交往中，邮友间以邮会友，以诗会友，还编辑刻印了《丁巳邮人唱和集》，收录了这些诗文。

70年代末期，上海市有关部门开始退还“文革”中查抄的邮票。由于查抄的邮集大部分登记在案，并在上海市博物馆保存，因而使许多邮集能顺利地物归原主。在退还过程中，有些珍贵的邮集，如“清代台湾地方邮票”邮集等，经过商议，邮政部门收购了几部。

1979年9月，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到上海，带来一些参加国际邮展的展品复印件，如《中国海关邮政史》、《中国人民邮政邮票》、《东北近代史》等等，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上海集邮家也挑选了一些藏品供水原明窗观看、研究。双方还对早期的邮政邮票史进行了切磋。这次会见是“文革”后上海集邮界第一次正式国际交往活动。

这个时期，上海市基层的群众集邮活动也很活跃。1979年9月15日，上海市少年宫举办“少年集邮展览”，在少年中推广集邮活动。10月23日，闸北公园举办的“中日邮票展览”吸引了

不少观众。1980年春节，工人文化宫举办“迎春集邮展览”，开幕之日使用临时邮局的纪念邮戳。

1981年7月1日，上海市集邮协会主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国邮票展览”。展品布置在170个展框8个展柜内，除邮票外还有明信片、实寄封、邮筒以及配合展出的章戳和钞票。展品中新中国邮票最引人注目，其中纪念邮票，特种邮票的原版、再版票并列展出，意在普及邮票的版别知识。此次邮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新中国错版票登上大雅之堂，纪20“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错版全套票及纪54“国际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未发行22分邮票公开展出。展品中还有民国票中的珍品，清代各版大龙邮票。最轰动的红印花“小壹元”新、旧票各一枚，也同框展示。2万多人参观了邮展。观众最感兴趣的是新中国邮票，对早期名贵邮票则兴趣不浓，这说明当时中国集邮普及水平尚低。

天津的集邮活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革”时期，天津集邮虽也在劫难逃，但是，原天津集邮公司的一些营业员调到邮局工作后，仍负责出售邮票。出于对集邮者的同情，他们在领取邮票时，常设法多凑一些成套邮票卖给集邮者，起到了保护集邮的作用。因此，进入新时期天津的集邮活动很快恢复起来。

1979年5月1日，中国邮票公司天津分公司恢复营业。集邮者在营业厅内外交换邮票，很快形成一个邮票市场。逢节假日，北京也来人在这里集聚买卖，促进了京津两地邮品的流通。

1981年6月10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邮驿史及邮票展览”。这是80年代初期北方大城市举行的规模较大的邮展。邮驿史部分展出中国历代传递信息的机构、制度、符牌、印信等文物和史料。其中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文献资料，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传递信息的凭证“铜龙节”，甘肃出土的汉代驿使画像砖，西夏驿站的铜牌，清代驿站的排单与清代邮差的号衣。

这些史料和实物引起不少观众的兴趣。邮票部分展品丰富,按发行时间的顺序展出。1. 商埠邮票和各类邮政用品。2. 清代邮政的大龙、小龙、万寿邮票,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还有一些试色样票。3. 民国票中,珍罕的加盖“临时中立”展出 23 种。4. 解放区邮票中,有引人注目的湘赣边省赤色邮票、苏维埃花卉图邮票以及华北、华东等 7 个解放区发行的邮票。其中名贵的票品有:晋冀鲁豫代邮券 8 种,抗战军人销印封等。5. 新中国发行的各种邮票。展品以馆藏的为主。

这次邮展影响很大,外省市及香港等地的集邮组织及个人有的专程赴津参观。后来展品经补充调整,又到北京、广州两地展出。

除上述几个城市外,江西省也是集邮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1979 年 10 月 1 日,南昌市邮政局集邮门市部在南昌八一公园邮电所开业,广大集邮者纷纷来此购买邮票,交换邮票,一个自发的邮票交换市场随之形成了。

1980 年 9 月,南昌市第二十中学举办“社会主义好”集邮展览,共展出中外邮票近 3000 枚。这是“文革”后江西省的第一次邮票展览。这次展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江西日报》、《南昌晚报》以及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对这次邮展先后作了报道。

1981 年 4 月至 1982 年 12 月间,南昌市残疾青年王云骑自行车游历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沿途收集邮政日戳并寄发实寄封达 300 多件。王云这种不畏艰险的集邮旅行,获得了各地群众的赞赏。1982 年 1 月,王洪新用王云沿途寄给他的实寄封编组了一部《残疾青年旅游全国实寄封》邮集,参加了广州“第二次邮票展览(体育专题)”。

二、探索中诞生的第一批集邮组织

1. 北京鼓楼集邮研究会

北京鼓楼集邮研究会是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领导下的群众性的集邮组织。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北京市第一个跨行业的社会集邮社团，也是“文革”后中国最早成立的集邮组织。

1979年7月，北京市东城文化馆编创组人员成志伟在馆办的铅印小报《钟鼓楼》上发表了一篇谈论集邮的短文《邮票杂谈》。随后，集邮者刘肇宁写信，建议把集邮者组织起来，由文化馆领导开展集邮活动。文化馆领导表示支持。此议报经东城区宣传部、东城区文化办公室批准后，开始筹建集邮活动组。

1979年8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集邮研究会”宣布成立。集邮研究会不设会长，推选成志伟、朱祖威、刘肇宁、邹毅、林轩5人作研究会领导成员。会后编印一期《集邮简讯》，报道成立大会情况，并附有研究会的章程。

具有700年历史的北京鼓楼，当时属东城区文化馆的一个活动站。集邮研究会成立后，经常在鼓楼大厅举办邮展、讲座及例会活动。后来，取“鼓楼”二字的文化涵义，集邮研究会改为“北京鼓楼集邮研究会”。

建立跨行业、跨部门的集邮组织，该由政府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是文化部门、邮政部门还是民政部门，这个问题自5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进入新时期，社会的大变革为发展集邮、建立有领导的集邮组织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以新时期的开拓精神，勇为人先，成立了集邮研究会，为后来一些外省市解决集邮组织挂靠问题提供了经验。从此，在政府部门领导下的有组织的群众集邮活动开始成为主流。

1979年10月1日至10月20日，鼓楼集邮研究会在鼓楼大厅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邮票展览会”。这是“文革”后北京首次公开的邮展。

邮展展出了全部新中国的纪、特、普、航空、欠资票和J、T票及所有小型张。展出了解放区邮票中的一些珍贵邮票和清代大

龙邮票、小龙邮票、万寿邮票。此外，还展出了外国的专题邮票，这个颇富信息意义的窗口，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兴趣。据统计 1979 年国庆节期间，有上万人专程来鼓楼参观邮展。

这次邮展的方式仍是 20 年前的方法，没有护邮袋和贴片的概念，而是把邮票直接放在镜框内悬挂墙上。展框有大有小，形状不一，颜色不一，几近“原始”状态，但这里面凝聚着新时期集邮者的一种矢志不移的精神。

邮展举办之时，北京自发的邮票市场已具雏形，市场意识走进了邮展展场。有集邮者在邮展闭幕后以 500 元买断全部老纪、特新票及所有小型张。这个在公众场合高价购买邮票的实例，成为新中国集邮历史上的首次。尽管它相左于当时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具体政策，却昭示了集邮市场的前景。

《鼓楼邮刊》系鼓楼集邮研究会会刊。1980 年 4 月出版。16 开本，油印，每期 26 页—32 页不等。《鼓楼邮刊》在内容上侧重于集邮研究和集邮资料的编纂，使后人阅读没有“过时感”。该刊发表的一些研究文章，如《首套解放区邮票辨析》一文，对中国解放区邮票史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突破。油印本的《鼓楼邮刊》自 1980 年至 1982 年出版 17 期。

鼓楼集邮研究会除立足于办邮展、编邮刊、举办讲座一类传统的集邮活动形式外，还采取把集邮活动与国家的中心任务或重要活动结合起来的方法，把时代信息引入邮会活动，使邮会具有时代的朝气。

1981 年夏天，中国四川、陕西、甘肃一些地区遭受特大水灾。当时全社会正在开展“五讲、四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鼓楼邮会号召会员捐款赈灾。为了把赈灾与集邮活动挂钩，邮会建议会员捐出自己的邮品，在会内义卖，所收款项全部支援灾区。这次活动得到会员全力支持，全体会员 47 人都捐出邮品。这次活动是集邮界影响很大，突破了严禁会内买卖邮票的

规定。虽说是赈灾义卖，实质也是邮品交流的一种形式。

2. 广州市集邮学会

1980年1月1日，广州市两位青年集邮者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一个集邮展览，为期10天，展出新中国邮票360套1700多枚，还展出一些外国邮票、集邮书刊等。这是“文革”后广东举办的第一次邮展，它标志着广东集邮的复苏。

1980年1月27日，十几位集邮者自发地在广州文化公园聚会，商讨发展广州集邮，建立集邮组织的问题。在广州文联和广州市青年联合会的支持下，1980年3月20日，在广州吉祥路百花花园举行“广州市集邮学会”成立大会。广州市委、市文联有关负责人到会祝贺。大会通过了《广州市集邮学会章程》，聘请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局长李清万为名誉会长，常增书为会长。

广州市集邮学会成立后，注重集邮的普及和发展基层集邮组织等工作。与市青年文化宫合作开办集邮俱乐部，举办集邮讲座，交换邮票等活动。学会还组织会员分区活动，推动工厂、学校建立集邮组织，开展群众集邮活动。1980年，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等十几所大专院校先后成立集邮组织。1981年，广州越秀区200多名少年集邮爱好者与广州市集邮学会的集邮家相聚，常增书向小朋友介绍集邮知识。会上，成立了越秀区小集邮爱好者活动组，推动了广州少儿集邮活动的发展。

1981年春节，广州市集邮学会举办首届广州邮票展览。展览分58个专题，共288个展框和17个展柜，展品有邮票、首日封、实寄封、极限明信片、邮戳以及集邮报刊等。展品由广州市集邮学会向全国及美国、日本、加拿大、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位集邮者征集，经过评审选出124位个人、2个单位的优秀邮品参展。邮展于2月5日开幕，当日使用纪念邮戳。邮展为期20天，观众达15万人，盛况空前。

广州市集邮学会的创建以及开展的各种活动，为广东省一些

市县集邮者提供了经验。1981年，韶关市、佛山市、顺德县、梅县等集邮组织都按照广州市集邮学会的组织模式挂靠在当地文化部门。广东省集邮呈现繁荣景象。

广州市集邮学会创办的《集邮家》报由广东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批准，于1980年9月15日首发。此报为8开4版。它是“文革”后全国第一份市级集邮团体编印的正式出版物。1980年创刊号上发起“集邮回忆”、“我的集邮生活”征文活动，得到各地集邮者的响应。集邮者在“文革”中因邮票遭毁而所积怨气，在这里得到倾诉。“邮苑人物志”专栏专门介绍集邮人士的集邮活动、经验和成就，使读者从他人事迹中受到启迪、鼓舞。《集邮家》报在全国公开发行，对推动广东省及全国集邮活动的开展起到很好的作用。

后来，广州市集邮学会根据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对全国省、市及基层集邮组织名称统一为“协会”的要求，将“广州市集邮学会”改名为“广州市集邮协会”。原来由广州市文联领导，改由广州市邮政局领导，纳入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组织系统。

在这个时期各地成立的集邮组织，大多挂靠在文化部门。1980年11月20日，无锡市文化馆集邮研究会成立，由文化馆馆长出任理事长。随后，无锡市工人文化宫又组织成立了无锡市职工集邮协会，归市工人文化宫领导。1981年1月1日，由南京市工人文化宫领导的集邮组织——南京市工人文化宫集邮研究会成立。此后成立的有苏州市工人文化宫集邮研究会、湖北宜昌市群众艺术馆集邮组、由长沙市文化局领导的长沙集邮组、扬州市文化馆集邮组、南通市文化馆集邮组、哈尔滨道里文化馆集邮小组、天津蓟县集邮协会以及经湖南益阳市文联批准成立的益阳市集邮协会等等，都挂靠在不同级别的文化部门。

这些集邮组织成立后，由主管的文化部门拨出经费，提供活动场地，开始了有领导、有计划的活动。后来，随着邮政部门领

导的上海市集邮协会、北京市集邮协会、广州市集邮协会的成立，集邮组织划归邮政部门领导已成大势，这些集邮组织均改换名称，由邮政部门统一管理。

三、收集范围的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集邮》杂志是全国惟一的权威性邮刊。中国集邮者所能了解到的邮识、信息，惟有从《集邮》上获取。有关新中国邮票的特殊信息，如错版票出现，只要《集邮》不予披露，集邮界便一无所知。

1958年，《集邮》杂志开展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邮票的专题讨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邮票采取了一律否定的态度，这就在人们的收集范围上设置了禁区。60年代初期，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也被贬斥。于是，集邮者的收集视野被迫收缩在“中国邮票”的单一区域。60年代中期，《集邮》杂志又开展了关于集邮革命化的讨论，把集邮与阶级斗争挂上了钩。对清代邮票的研究，对老一辈集邮家的研究成果予以全盘否定。极左思潮造成的舆论压力将中国集邮的理论研究也赶上了“新中国邮票”的独木桥。至于新中国邮票中那些因所谓政治问题未发行的邮票、错版票等，《集邮》杂志更是讳莫如深，不作只字介绍，致使60年代的青少年集邮者，对纪20“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错版票，纪92“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公元前”错票，特15“天安门放光芒”票，特62“京剧脸谱”未发行票等情况一无所知。自然这些也都形成了集邮上的禁区。

“文革”中，五六十年代发行的一些邮票，又纷纷被说成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被宣布停止使用。谁收有这些邮票，一旦被揭发出来，后果不堪设想。1972年，又有十几种与林彪有关的邮票被停止使用。这些邮票有：纪109“遵义会议30周年”第3枚“娄山关大捷”，特7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

枚“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第7枚“四好连队”，文2“毛主席万岁”第1枚“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摘要”、第5枚“毛主席和林彪”、第6枚和第7枚“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第8枚“毛主席和林彪”，文5“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4枚“红灯记”，文7“毛主席诗词”第6枚“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文8“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林彪题词，文11林彪1965年7月26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邮票题词，文16钢琴伴唱“红灯记”全套2枚，编号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第37号“红灯记”。这对集邮者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收集“禁区”。

70年代末期，拨乱反正使集邮者的主观收集意识和审美需求，大大地漫出“文革”和“文革”前圈定的设防。新时期的集邮要求打开国门，让反映不同文化艺术的外国邮票走进来；要求破除禁锢，把中国清代、民国以及新中国的各种所谓有“政治问题”的邮票解放出来。于是，五六十年代曾出售过的苏联及东欧诸国的邮票，又出现在北京邮票市场上。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的专题票也陆续纳入集邮者收集范围。台湾邮票也开始少量进入内地。台湾邮票很有市场，那些书画、文物以及表现中华民俗文化的邮票格外受人珍爱。20多年设置的集邮“禁区”一个个地被冲破。思想解放、收集档次较高的集邮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新中国五六十年代那几套错版票和未正式发行的邮票上来。

80年代初时，有集邮者以高价寻求纪20“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错版票。这套邮票票名错误在十月革命时还没有苏联。这套邮票定于1953年2月14日发行。2月7日上海邮局从发行公告中看出邮票名称有误，向邮政总局指出。邮电部通电全国邮局停止出售这套邮票，但已有近百个邮局卖出4700枚。湖南省更是售出4万多枚。

1956年6月发行的“首都名胜”邮票，其中第3枚图案为天安门。邮票的画面表现天安门城楼在朝阳下光芒四射。但由于印刷条件所限，只能用雕刻版单色印刷，旭日彩霞的色彩无法表现出来，其设计效果被认为“乌云遮日”。此票被暂停发行。后由设计者重新设计。故原票流市量极少。

1980年“京剧脸谱”邮票发行后，深受集邮者欢迎，一些中老年集邮家开始寻求“文革”前那套未发行的“京剧脸谱”邮票。1964年4月准备发行一套8枚的“京剧脸谱”邮票，编号为“特62”。这套邮票已经印成6枚，《集邮》杂志也公布了新邮预报，但一直迟迟未发行。其原因是恐被曲解为与当时的京剧革命现代戏的上演“唱反调”。后来，将印好的邮票送到北京通县一家造纸厂，粉碎制浆再造纸。在粉碎过程中，有些邮票飞出墙外，被当地农民捡到。所以，此票有少量流市。

这个时期一些民间邮刊上，陆续刊登一些新中国变体票的资料、信息。如山东德州的《集邮通讯》载文介绍纪28“北京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纪念”有6种票幅，特2“土地改革”100元、200元、400元有漏齿票，纪14“国际保卫儿童会议”横齿孔移位等等。北京的《鼓楼邮刊》以连载的方式刊登文章《奇花辨异》，对新中国纪、特、普、“文革”、编号票的版别、纸质、齿孔、票幅、刷色等等变异情况一一列出。

四、新闻媒体关注集邮

中国集邮的恢复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新邮的选题拓宽，发行频率加快，特种邮票（T票）发行套数增加。在邮票品种上亦恢复了发行中断十多年的小型张。第二步是宣传集邮，提倡集邮，尤其是对新发行的邮票的宣传。

从1977年到1979年这三年多时间里，《集邮》杂志尚未复刊，民间邮刊没有出世，对新邮票和集邮宣传的媒体，历史地落

在几家报刊上。

1. 报刊连连发表集邮文章

1978年是中国恢复集邮活动重要的一年。7月1日，中国邮票公司恢复国内营业。这一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体育报》均以较大篇幅介绍清代邮票、解放区邮票、新中国邮票、外国体育专题邮票以及邮票展览信息。这些文章已有十几年未见报端，在广大集邮者中产生了共鸣，使他们看到了中国集邮的希望。这几家重要报纸发表集邮、邮票的文章，也使社会对集邮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同时激发了许多青年人的集邮兴趣，推动了恢复集邮活动的进程。

1979年2月23日《工人日报》刊登赵文义的《世界第一枚邮票的诞生》，向读者讲述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诞生的故事，普及邮票知识。

1979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扬的文章《寸方纸上，气象万千》，该文叙述了邮票的问世，当代世界邮票选题取向，以及邮票的形状、印制材质的历史变迁。文章言简意赅，曾被选入小学生语文课本。

《体育报》刊登介绍体育邮票的文章。王扬的《富有民族色彩的朝鲜体育邮票》、《日本体育的缩影——日本体育邮票漫谈》等文章都占了较大版面，并有邮票配图。

1979年11月4日《人民邮电报》发表林轩的文章《金属箔邮票》，介绍了金属材质印制的邮票，这个全新的内容引起读者的兴趣。《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以及《我们爱科学》、《人文杂志》、《文化与生活》、《辅导员》等杂志都陆续刊登有关集邮和邮票知识的文章。

集邮家姜治方以《集邮六十年》为题撰写的回忆录于1979年8月在《湘江文艺》第8期上开始连载，同时也在香港《百花》周刊上发表。回忆录记叙了作者从1917年10岁时开始集